

中国思想史论集

(第三辑)



张岂之 谢阳举 主编



中国思想史论集

(第三辑)

张岂之 谢阳举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市临江路10号

www.gxnu.com

张岂之 谢阳举 主编

中国思想史论集

(第三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541004

广西

桂林

广西

张岂之 谢阳举 主编

中国思想史论集

(第三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541004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市临江路10号

www.gxnu.com

张岂之 谢阳举 主编

中国思想史论集

(第三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541004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0-001-1000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中国思想史论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思想史论集. 第3辑 / 张岂之, 谢阳举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5633-7810-4

I. 中… II. ①张…②谢… III. 思想史—中国—文集
IV. 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468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24 千字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1 000 册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81 张其成 向康本原的孟非解者已翻李宗
神道始感思学解已存礼舞整个儿韵舞发味跟谁举小即即

177 陈 强

181 张其成 向康本原的孟非解者已翻李宗
神道始感思学解已存礼舞整个儿韵舞发味跟谁举小即即

177 陈 强

181 张其成 向康本原的孟非解者已翻李宗
神道始感思学解已存礼舞整个儿韵舞发味跟谁举小即即

177 陈 强

中国思想史理论探讨

- 历史唯物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张岂之 1
-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视角管窥 江心力 7
- 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历史性”与“思想性” 李桂民 23
- 论中国思想史的学科自觉 谢阳举 34
- 老学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刘固盛 49

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

- 儒学与神学关系试探 张茂泽 57
- 汉代“得民和”政治理念的思想史分析 王子今 75
- 《淮南子》的道德仁义观 王 雪 88
- 裴颢的政治哲学与西晋的世族政治 王光照 101
- 宋代《诗经》学与三家《诗》的关系论略 陈战峰 118
- 书院的兴起与唐宋之际的社会文化环境 肖永明 137

- 论李觏与苏轼非孟的根本取向 周淑萍 161
- 阳明心学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逻辑环节与禅学思想的影响
..... 赵 旗 177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 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论争的哲学解读 麻天祥 189
- 《明儒学案》研究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理论与方法 方光华 212
- 内外有别:20世纪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
想象 欧阳军喜 224
-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思想的派分与联合 曹天忠 236
- 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林家宥 255
- 徐复观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朱丹琼 267

中国思想史专题研究

- 百年来《周礼》研究的回顾 刘 丰 287
-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及其反思 刘惠琴 307

中国思想的现代价值研究

- 《墨子》经济思想的生态阐释 赵麦茹 329
- 事件哲学论 武占江 346
- “伦”的传统及其“终结”与“后伦理时代” 樊 浩 361

附录

兼和·守正·日新	张 邕 之	376
“第二届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	湛 风 斯 人	381
编后小记		385

历史唯物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张岂之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任务。这个任务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我们的前辈马克思主义学人早已在这方面开始探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我想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前辈马克思主义学人侯外庐如何在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的特色。

侯外庐对历史唯物论的学习和研究,直接来源于从1928年至1938年他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翻译。他说:“对于一部完整的科学理论,翻译中的理解角度,往往不同于阅读中的理解角度。我在历史研究中所注意的研究方法,相当程度取决于我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认识。”^①这一认识可以归结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也就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

^① 侯外庐:《初的追求》,51页,北京:三联书店,1985。

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运动规律的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是在怎样的社会存在中产生、演变和发展,有怎样的社会作用,对今天又有什么启示。侯外庐将历史唯物论的指导称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这贯穿于其《中国思想通史》全书。

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是我国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成果,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著作需要后学者加以研究,看前辈学人如何运用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的思想学说,以便推动这门学科的发展,同时解决其中的一些尚未解决的疑难问题。

学人们要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关于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具体结论,这是不可能的。《资本论》的主题不是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没有一句话提到中国。因此用历史唯物论来指导关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的研究,就要在艰苦的研究中,寻求问题的答案。

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论述,但在分析以印度为主的东方古代社会时,曾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少学人注意到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重要的论断。由于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并不十分明确,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和内容,国际学术界产生理解上的巨大差异,并引发尖锐的论争。在这种情况下,侯外庐考察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有关著作,查找了一百多条有关东方古代社会的论述,形成了对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断的全面理解。在此基础上,1945年侯外庐发表《我对“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学家商榷》这篇重要论文,提出了他的研究心得。1946年他又在修改《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1)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古代

^① 最早见于《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中都有论述。李鼎三:《序言》,页19,《李氏遗著》,商务印书馆。

社会史》(1955年再版时定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将其观点系统论述。侯外庐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阶段(奴隶制社会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古代文明的路径不是只有一种;有古典的形态,还有非古典的形态。古代希腊属于前者,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则属于后者。二者的差别,概括来说,古典的古代是“革命的路径”,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改良(维新)的路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古代表现为:和希腊不同,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保留了旧有氏族组织的残余,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组织;这种状况演变成为血缘的宗法制,严重地影响着后来中国封建制社会和思想。侯外庐对有关材料进行审查与考订,同时也参照了他以前和与他同时代的学人的研究成果,才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侯外庐将他的研究作了这样的归纳: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进而研究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既要遵循社会发展史的普遍性,但在特殊的历史规律上,我们又要判别具体的社会发展的具体路径”^①。这就是要找到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的特点。这种研究也就是要解决历史的疑难问题。侯外庐强调:“解决疑难只有在现象的背隐处去发掘,个人之自得越深刻,则本质的意义愈能表露。故自得亦即所谓‘资之深,取之左右而逢其源’者是。”^②

今天,学人在大量考古新发现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已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再看侯外庐关于中国从氏族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时特点的分析,哪些是准确的,哪些需要修正,可以看得比较准确,这些都是学术发展中很正常的事。然而更加明显的是,侯外庐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特殊路径的观点,以及他对于氏族贵族统治的形成、发展和衰落过程的研究,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是20世纪史学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在20世纪40年代,当侯外庐的《中

①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② 《初的追求》,269页。

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时,他写下这样的感受:“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发掘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①这不仅是侯外庐个人的自豪,而且是历史事实的反映:在上个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不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不必言必称希腊,他们努力将历史唯物论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进行创造性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充实和发展了历史唯物论。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之后,今天我们回顾 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当承认这样的客观事实。

侯外庐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有三个阶段,这就是西周时期“学在官府”的氏族贵族之学,演进为春秋时期倡导私学的孔墨显学(即儒家学派和墨家学派),再进到战国时期繁荣的百家之学,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古代社会反映于社会思想,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思想和西方思想的古希腊阶段相比,有自身的特色。希腊古代思想在起点上表现为追求知识、力求解答宇宙根源问题的“智者气象”,而中国古代思想在起点上则表现为重视道德论、政治论和人生论的“贤人作风”,究其原因,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路径有关。

侯外庐曾经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关系如何?什么才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联结点?思想史、哲学史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如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逻辑思想等),在历史发展中先后有怎样的不同,又有怎样的差异?在他看来,要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研究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它不是个别思想家的思想,而是基于社会存在而形成的某一历史阶段思想上的主要内容和特色的表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原则在

^①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又见《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思想史研究中便体现为一定的社会存在反映于一定历史时代的思潮,通过这样的中间环节才能发掘出个别思想家与社会历史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多层次的。在社会思潮中可以看到作为一定社会历史中不同阶段、阶层的思想观点,同时也展现出作为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普遍性因素。侯外庐认为,我们不能像西方某些研究者那样认为历史就是思想家的历史。事实上思想家头脑里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的反映;这种反映极其复杂而曲折。因此在研究中,人们通过社会思潮这种“中介”将社会史与思想史联系起来,并将前者作为思想的来源;当然,也应当看到思想自身的渊源、发展关系,但这也离不开社会存在作为应有的依托。在《中国思想通史》每卷中都有“绪论”,它对一定的社会存在及社会思潮作了理论的概述,以此将社会史与个别思想家的思想联系起来,在许多地方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

侯外庐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并不限于奴隶制社会阶段,他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至第五卷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封建制社会的社会史与思想史之间的联系。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介绍。我只想指出一点: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到第三卷,关于社会史与思想史相互关系的论述,以及作为这二者间中介的社会思潮的分析,不论是否同意他的具体观点,人们都承认这是融通一体的、自成一家之言。侯外庐晚年自述认为“第四卷在总体上还是留下了粗糙的痕迹”^①,关于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联结在一些环节上不是那么融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并不是由于历史唯物论本身,而是由于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里,研究者在运用历史唯物论的时候缺少了应有的耐心。人们都知道,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的领域内,不能直接由经济基础决定,要经过上层建筑中的某些中间环节的折射,才能见其影响。这些中间环节是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也可能是其他社会思想。揭示这些中间环节与哲学思想和

① 《韧的追求》,299页。

·页128《东方国史》

逻辑思想之间的联系,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研究。也就是说,将历史唯物论具体运用于学术研究,对任何一个观点的阐述,都需要有充分研究的积累。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侯外庐和他的合作者及助手在撰述《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时候,缺少一个使他们从容不迫地进行深入研究的客观环境,在论述中出现一些“粗糙”,这是可以理解的。从这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用历史唯物论来指导中国思想史研究,不在于引用了多少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而在于如何按照历史唯物论的原则,通过社会思潮的折射将社会史中思想的实在内容揭示出来,这没有“十年磨一剑”的毅力是很难做好的。

在当代学术评论中,有同志用“侯外庐学派”这个词,这并不过分,因为在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过程中,侯外庐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学人一起工作,其中有杜守素、赵纪彬和邱汉生。他还一直热心培养研究思想史的年轻学人。学派的形成,不在于著述的多少和人数的多寡,而在于研究成果的创新和精神世界的自得。侯外庐在《初的追求》第三章《〈中国思想通史〉的撰著》中深情地回忆起他们共事的情形,十分令人感动。他这样说:“我和我的同志们虽然花了几十年的心血完成了这样一部比较系统的《中国思想通史》,但是,要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体系殊非易事。尽管有同志说我们的思想通史是自成体系的著作,而我们却不敢以此自诩。我很想说明一下,我们在史学研究所注重的不是自己的‘体系’,而是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结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遗产。”^①沿着前辈学人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前进,是继续建设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后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原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① 《初的追求》,327页。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视角管窥

江心力

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研究,从《庄子·天下》篇到章太炎的《馥书·清儒》,可以说源远流而流长。二十世纪学术史的研究更是异彩纷呈、蔚为大观:一是以关注时代和思潮演变为视角,对学术的发展进行历史的探讨;一是以关注人生问题的根本解决为视角,对学术的发展进行了哲学的探讨;一是以关注学术的经济与社会的基础为视角,把学术史的研究建立在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之上,走出了一条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学术史的新路。

一、关注时代与思潮的学术史视角

二十世纪初期,关于什么是学术,梁启超发表过明确的见解,他在《学与术》一文中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

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显诸用者也。”^①刘师培在《国学发微》中说:“学也者,指事物之原理言也,术也者,指事物之作用言也。学为术之体,术为学之用。”^②这就是说,真正的学术必须有明确的理论体系与方法体系。思想家们反观传统学术体系,认为传统学术历史进化观念贫乏,从中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传统的学术方法论体系也缺乏严密的逻辑,需要加以改造。1902年,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新民丛报》的“学术”栏发表。他在《总论》中指出,自己的宗旨是总结中国固有的学术思想之得失,以西方文化参补之,从而恢复上古与中古时代“我中华第一也”的学术思想,“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③就著述形式而言,《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改变了过去单篇论说、笺证疏义、读书札记、传承表等体式,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学术史写作模式。在《总论》中,他以学术思潮的演变为依据,把截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划分为八个时期:“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④全书即按这一顺序展开讨论,就主导思想而言,梁启超还是要汲取西方思想学说,复兴中国学术文化,在《总论》的结尾表达了这种深切的心情:“盖大地今日只有两个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吾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辑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纵贯全史的视野,配以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② 刘师培:《刘申叔遗书》第13册,宁武南氏排印本,1936。

③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④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6~7页。

分章分节的体例,纲目清晰,史论互证,分而不散,合而不乱,新意迭出,引人入胜。胡适《四十自述·在上海》说此著“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以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埋下了他后来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种子。

1920年,梁启超又写出了《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继承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写作模式及宗旨和指导思想。梁启超在自序中说:“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疑问。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对“时代思潮”的认识,他说:“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②同时又说:“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从时代思潮的特点看,是一个盛衰的发展过程,梁启超说:“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③两年后,他出版了讲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思路主张及写作模式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周予同认为:“梁氏论述近三百年学术史,实在是从章太炎《清儒》那里来的。”^④朱维铮认为还取材于1907年刘师培发表的《清儒得失论》。《清儒得失论》着重通过明学与清学的比较,揭示清代学者之“病”,说明学术与政术、立言与事功的矛盾关系,认为清廷的文化政策将大批学者驱入经史考证的狭小天地,使之在实践上无所作为乃至卑污从俗。

梁启超以后,钱穆也出版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人为线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② 《清代学术概论》,1页。

③ 《清代学术概论》,2页。

④ 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83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索,勾勒思想学说的轮廓是其主要的特点,从形式上看,继承了黄宗羲创立的写作模式;从内容上看,由于进化论思潮的影响,钱穆关于思想学说发展的脉络叙述更加清晰,历史演进的观念渗透进了思想学说研究的领域。

二、关注人生问题之根本解决的哲学史视角

随着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建立和发展,一批博通中外的学者应邀讲学,于是就有了各种哲学著作,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其中的卓越代表。该书写定于1918年9月,出版于1919年2月,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该书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本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先秦学术思想的著作,从宗旨、思路到写作模式都有了崭新的变化。

第一,胡适确立了“明变、求因、评判”的写作宗旨。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写作主张,他说:“我的理想中,以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的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申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系统的哲学。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这两个字。然后还须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这便叫做‘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这便叫做‘求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这样胡适就系统地提出了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学科的必备条件或主要宗旨。

第二,胡适以关注人生问题的根本解决作为基本的思路,与梁启超关注时代思潮略有不同。胡适在《导言》中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后

来他对这一定义略有修正。1923年,在以“哲学与人生”为题的讲演中,他说:“根本两字意义欠明,现在略加修改,重新写一个定义:‘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一个比较可普遍适用的意义。’”根据这个定义,胡适认为哲学应包含几种大的问题,如(一)天地万物是怎样来的;(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四)怎样才可以使人有知识;(五)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六)人生究竟有何归宿;等等。如果“把这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①。

第三,胡适把知识、方法论问题提到研究的中心地位,是不同于其他学者的又一特色。胡适用名学或逻辑的概念指称广义意义上的哲学方法,相当于西方哲学的知识论或方法论,应当指出,该书中名学或方法论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知识形式的规范,如概念、判断、推理及相互关系的规定,它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逻辑学;二是关于知识来源、获取知识的方法、知识的真伪与效用的检验,等等,这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知识论。前者,胡适书中有时称为名学、论辩方法;后者有时称为哲学方法、知识论,有时称作心理学。胡适把名学方法视为各家哲学的中心,视为古代哲学发展的主线。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将古代哲人的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人生哲学都与其名学方法挂上钩,以其名学方法统贯起来。

有趣的是,听过胡适课程的傅斯年,很不赞同中国哲学史的提法,他甚至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其他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是中国学术的羞愧,但傅斯年却把它看做是一种“健康的习惯”,他说:“我不赞成胡适先生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呼作哲学史,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感谢上帝,给我们民族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大凡用新名词称旧物事,物质的东西是可以的,因为相同,人文上的事物

^① 胡适:《哲学与人生》,《东方杂志》20卷23期,1923。